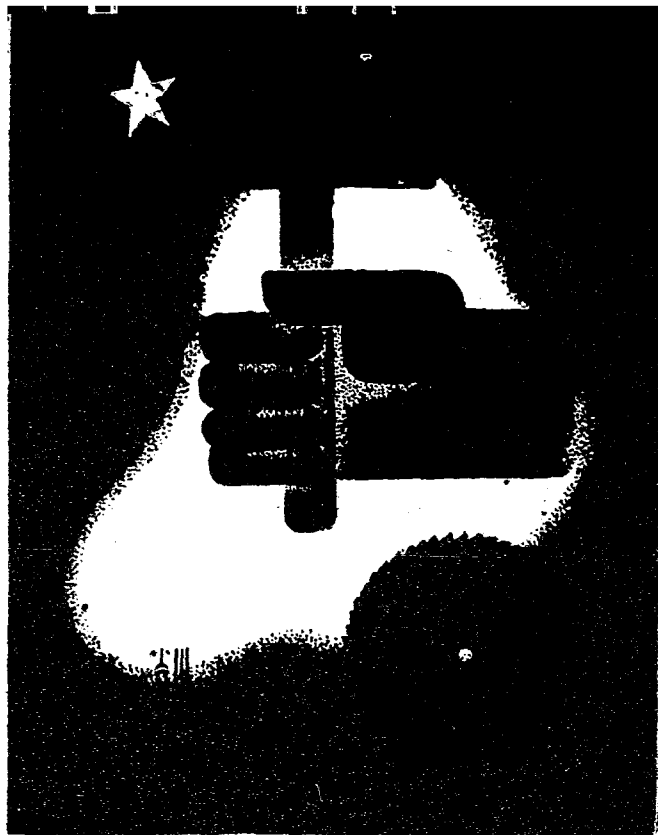


中蘇互助論



大時代叢書之七十

沈志遠著

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MG
D829.512
66



中
蘇
互
助
論

沈志遠著

大時代叢書



3 1763 2086 3

中蘇互助論

一 導論

自從我們抗日的民族解放戰爭爆發以來，中國和蘇聯的關係，已成爲舉世矚目的問題，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中蘇關係的意義，也確實隨着我們反侵略的全面抗戰的展開，而日見其重大了。

就我們國內的輿論和民衆的意向而言，對於改變和促進中蘇關係的問題，早在一九一八「」事變直後就已成爲一個注意和檢討的對象。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蘇的恢復邦交，便是全國輿論和民衆意向的一種重大收穫，也是我政府當局對外國策上的一個重大轉變。



(南)

復交以後的四五年中，兩國關係雖因國際上和內政上的種種牽制，而沒有發生根本上的進一步的改變，然而大體上還是向着好轉的方向在發展的，那怕這種發展是很遲鈍而很迂緩。記得一九三三年當日寇進犯長城各口和以後接着強迫我們簽訂塘沽協定的時候，全國的輿論界於憤恨悲痛之餘，都或明或暗地主張在外交上聯蘇以制日。例如申報月刊社會爲這事邀集了上海的許多學者名流和時論家，（他們平時一般的立場都各異的）特地舉行過一次座談會。討論的題目是：我們應當採取那條外交路線——倫敦的，東京的，抑是莫斯科的？雖然當時的環境還不容許人們關於聯俄問題暢所欲言，但是那次多數人的意向，顯然是主張恢復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的。當然主張聯英美的也很多，可是主張跟日寇攜手的却絕對沒有。其他的報章和雜誌上，都無不轟轟烈烈地檢討着這一問題，無不一致的反映着上述的民意要求。

由於日寇不斷地得寸進尺，無厭地發洩牠的貪慾與野心，全中國人民反日仇日的情緒，就愈來愈普遍地高漲。一九三五年北平青年的「一二·九」運動，便是那種高漲的情緒的爆發。隨着這種反侵略的民族革命運動的高漲，中蘇合作制日與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的呼聲，也普遍地響亮起來。當時世界知識社也舉行過一次規模較大的座談會，討論太平洋集體安全制的建立問題。大致的結論是：一方面與太平洋有關的各國人民大眾應一致團結起來反對侵略，一方面擴大蘇蒙互助協定為完整的中蘇互助協定，並以此為軸心，吸引真誠要求和平的列強（英美法荷等）參加，以造成太平洋的集體安全制。這種主張決不祇是該次座談會的參加者的意見，實際上它反映着全國開明之士和一般愛國大眾之要求的。

蘆溝橋民族解放的軍號打破了六年來的窒悶空氣之後，中蘇兩大民族進

一步的合作，不但成爲我國朝野一致的呼聲，而且也是全世界和平民衆的迫切的希冀。兩國政府雖於去年「八·一三」滬戰發動後不久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但是這樣一個消極性的條約，其不能適應目前異常嚴重的遠東局勢之要求，是十分明顯的。

在目前，中蘇關係的演進，確已成爲遠東乃至世界政治的重心。它對於今後太平洋的永久安全，對於全世界的和平正義，實起着決定的作用。中蘇兩大民主國家之互助合作，從兩國的客觀條件上說是完全可能；從它們的主觀要求上說亦是絕對必要；這幾乎是無庸置疑的了。就我國的立場來說，我們要驅除日寇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最後勝利，除在全國團結統一的基礎上貫徹抗戰到底的國策外，在外交上必須爭取跟我們利害關係最一致的蘇聯的援助（自然同時也絕對不放棄爭取其他友邦的援助）。應當順便地指出，爭取這種援助的努力，現

在已經有了相當的成績。再就蘇聯的立場來說，它要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和平），要阻擋和根絕日本法西斯軍閥進攻的企圖，以及貫徹地扶助被壓迫民族以實現全世界反侵略勢力的聯合這一基本國策，它也絕對地需要與革命進程中的中國合作，予中國以實力的援助。

這樣，中蘇合作互助的問題，不但是當前兩國民族自己最重大的切身問題，是恢復遠東和平、抑制侵略凶燄的一個有決定意義的中心問題，而且也是全世界被壓迫大眾和一切民主和平勢力殷殷盼其早日圓滿解決的問題。我們用客觀的態度，替兩大民族各自的利益着想，無疑地希望中蘇的互助合作，能夠愈早實現愈好，因此，為大中華民族之一分子的我們，就應當從實踐上去為貫徹這一希望而努力。但是實踐不能盲目的，不能不拿正確的認識作為指導。國與國的關係的轉變，決不像個人與個人的交誼關係的簡單。它的變動，跟許多的條件有密

切關係如歷史的背景，客觀的基礎，主觀的要求，當前的國際形勢，乃至當事國的內政情況等等。爲要在促進中蘇合作的努力（實踐）中，避免陷入迷途而爲敵人所利用，亦且爲使這種努力能夠發揮它最大的效果起見，我們對於兩國互助的問題，必須從上述此種條件上作一番比較周密的考察，以便正確地把握這問題的本質。意識上有了正確的把握之後，我們的奮鬥的實踐才會得到圓滿的收穫。

二 史的回顧

要明瞭現階段的中蘇關係及其發展的前途，對於它的歷史的過程作一番簡略的回顧，當然不是多餘的。

講到中蘇兩國過去的關係，簡括地可以說有它的值得慶幸的方面，也有它的令人痛惜的方面。不過令人痛惜的方面，實在是由於雙方政策上一時的誤會、失常和衝突，是一種慘痛的歷史的錯誤，自然也是歷史發展的曲線中難以避免的現象。值得慶幸的地方却是兩國關係發展的歷史必然性之正常的表現。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蘇關係的演變，大概很顯明地可以分爲四個時期。第一時期是蘇俄革命後到一九二四年中蘇訂立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時止，爲中俄關係的根本改變時期，亦即兩國平等關係的實現和確定時期。第二從北京協定

訂立時起，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高潮終止，國共兩黨分家時止，是兩大民族密切合作的時期。第三，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我南京國府宣告對蘇斷絕國交時起，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中蘇恢復邦交時止，這是兩國關係的黑暗時期。那時兩國政府祇有互相仇視敵對，根本談不到任何的邦交。第四時期便是從恢復邦交到目前，是兩國友誼重新好轉和再度過渡到密切合作互助的時期。這四個時期的發生和轉變，都各有其一定的特殊的國際上和內政上的原因。所以我們在兩國關係演變過程的敘述中，同時必須附帶地，那怕很簡略地說到每一時期的國際環境和國內政情。

一九一七年俄國波爾塞維克（即多數派共產黨人）的革命，先後推翻了帝制和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了工農勞動大眾的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之後，俄國的對外政策和民族政策，立即起了根本的轉變。蘇維埃的對外政策是主張和

平，反對侵略。它願意與世界上一切國家維持和平正常的經濟和政治的關係，對任何侵略和併吞（領土和主權）跟這種政策有密切聯繫的，是它的民族政策。它主張徹底的民族自決；對於帝俄境內的一切民族（特別是被帝俄壓迫的那些落後的弱小民族）和世界上任何被壓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蘇維埃政府均一律承認其完全的自主權；任何民族均有自己決定其命運的絕對權，直到與宗主國分離而自建獨立國的權利為止。因此，對於世界上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蘇維埃始終堅持着同情和援助的態度；帝俄時代的侵略和奴役弱小民族的大俄羅斯主義（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從十月革命的翌日起，已被蘇維埃政府一變而為尊重和扶助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的革命政策了。

由於當時特殊的國際情勢，蘇俄的推行這種政策，更有其特別迫切的需要。十月革命直後的六年中，國際形勢的特點是戰爭與革命。大戰停後，各國社會革

命的怒潮普遍地高漲起來；世界勞工階級的解放運動已經由想像而變為實踐，同時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反帝鬥爭，也變成了整個世界無產階級反資本的革命巨潮中的一個強大的支流。在這種情形之下，蘇俄的積極推行其革命的民族政策，放棄帝俄時代的殖民地宗主權（例如尊重芬蘭、波蘭及沿波羅的海諸小國的獨立），放棄對半殖民地國家的一切特權，並積極同情與扶持那些民族反帝的解放運動，這一切都是爲着推動世界革命的發展；爲着全世界社會革命的利益，蘇俄的這種對外政策自然是十分重要的。

蘇維埃政府自動對中國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帝俄在華的一切特權，重申其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獨立完整之立場，對中國的反帝運動表現其熱烈的同情，——凡此種種，都是上述政策在中國的具體運用。

在中國方面，正當那個時候，國內的民族解放運動蒸蒸日上地在高漲起來。

「五四」運動及其直後幾年中的反帝反封建運動的蔓延和深入革命潮流的逐漸澎湃，從廣大的民衆中間湧現出來強烈聯俄傾向。當時我國的中央政權雖尙操在北洋軍閥手中，可是因爲東鄰日寇得步進地對我實行侵略，對於一個以平等待我的國家，縱然主義不同，當然也願意跟它維持正常_的友誼關係。因此中國北京政府於一九二四年就正式承認了蘇維埃政府，重新建立了中蘇的正常邦交。一九二四年中蘇協定的成立便結束了兩國關係發展的第一時期。

隨着世界資本主義的走入所謂相對穩定時期，曾因戰爭革命和經濟破產而一度（大約有十年光景）放鬆了對華侵略的歐美帝國主義列強，這時又捲土重來，加強其對中國民衆的榨取和對民族資本的壓迫。這種變本加厲的侵略和壓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全中國各階層人民的反帝怒潮。加以帝國主義者各扶持一派軍閥，當作牠們侵略中國的政治工具，致釀成連年不斷的內戰形成封

建割據的局面。因而反帝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必然是反封建的民權革命運動。開端於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慘案的震驚全世界的兩年大革命，便是這兩道革命巨流的總匯。這也就是中蘇兩大民族密切合作之國際的和國內政治的背景。

在中國方面，領導國民革命的中國國民黨，於民十三年改組後，即採取該黨總理孫先生的三大政策：聯俄、容共、扶助工農利益。孫先生深知過去革命所以未能完成，是因為對內沒有把革命的基礎建立在廣大的民衆身上，對外沒有聯合能真誠援助我們的民族。於是從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起，除對內實行容共和扶助工農的政策外，對外則實行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首先是聯合蘇聯。

在蘇聯方面則確認中國國民革命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反帝運動的急先鋒；這一革命的勝利，將予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以十分嚴重的打擊，勢必大大地削

弱世界帝國主義的全副鎖鏈而使它的另一個環子（除舊俄的一環已於一九一七年斷裂外）又告斷裂的可能。因此，在社會主義的蘇聯看來，中國的國民革命確是全世界反資本的社會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於這一革命，正跟對於土耳其的革命一樣，蘇聯當然要採取積極援助的政策。在國民革命前夜和在全部革命過程中，蘇聯各方面——經濟、政治、軍事、技術、人才等等——援助中國革命的事實，是人人共曉的。假如革命的進程不遭遇到主觀和客觀的種種障礙而致中途停頓的話，假如當時共產黨的領導不犯機會主義的錯誤，國民黨的領導不改變其國民革命的基本政策而使這一革命順利地發展到「邏輯的終點」的話，那末中蘇兩國的密切的互助，一定會繼續加強而決不會突然破裂，致造成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整整五年的中蘇邦交上的慘痛歷史。

這樣看來，中蘇兩大民族的合作，主要地由於兩國革命的共同要求，及基於

此共同要求的合理的革命政策。兩國所處的國際和國內的局勢；國際方面是帝國主義者包圍蘇聯和侵略中國；內政方面是蘇聯要和平建設，復興經濟，鞏固蘇維埃國家的基礎；中國則要爭取民族獨立，推翻封建割據，完成國家統一，實現民權政治和澈底改善民生。這種國際和國內的政情，迫使兩大民族形成了強有力

的聯合陣線，同時，兩大民族的聯合，跟國內兩大政黨的合作，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尤有特別密切的關係。歷史的事實證明，國共兩黨的關係幾乎和中蘇兩國的關係形影相隨的。所以隨着民國十六年革命的天折，國共兩黨由親密合作突變為互相仇殺，中蘇兩國的邦交也就立即由惡化而破裂。

這一破裂當然不是偶然的。國際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國內資產集團因懼怕革命而脫離和背叛國民革命，以及由此而發生的國民統一戰線的破裂，國共兩黨的分離，中山先生革命政策的被放棄。自然，造成中蘇關係之悲慘的第三時

期的，主要和決定的原因還是內在的：即國共兩黨的破裂，國民革命的天折。由此就促成兩國間失去一致的革命要求，蘇聯仍然走着原來的路線，中國却完全背離了原來的路線。自南京政府成立時起，中國事實上放棄了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國策。相反的，它由反帝而變為親帝，由反封建而變為資產團集和封建殘餘的勾結合作。至於扶助和保護農工利益的政策，自然也連帶地變為違背和摧殘農工利益的政策了。

在另一方面，促使十六年革命夭折，間接促成中蘇關係惡化的，革命集團中的機會主義取消派的領導，它的所謂尾巴主義的政治路線，無疑地亦是要因之一。

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南京國府宣佈對蘇絕交到一九三二年同月同日兩國復交時止，在這短促的但多事的慘痛的歷史時期中，我們所見到的是

國內政治的分裂和腐化，繼續不斷的內戰，凋蔽不堪的民生，帝國主義的加緊侵略，國民經濟（主要的民族工業和農村經濟）的急趨崩潰，以及東北四省的失陷和淞滬協定的成立。這些便是中國丟去了一個患難朋友後所遭遇到的厄運！

在絕交後，一九二九年七月間，我東三省當局曾受美國帝國主義者的煽使，藉中東路事件為端，突向俄境進兵，遂引起了三個月嚴重的軍事衝突。這時中蘇兩國的關係，更惡化到幾乎要宣戰的地步。後來因為蘇聯紅軍的積極反攻，把我軍打得一敗塗地，那時東三省當局才恍然於上帝國主義者的當，而遣使至伯力與蘇聯議和，簽訂了伯力議定書。

在中蘇斷交的五年中間，由於我國在外拋棄了這位患難朋友的幫助，在內形成了兩重政權的尖銳對立，不斷地互相殘殺，政治不能統一，經濟民生陷於破

產，結果國勢日弱，招致了日本帝國主義匪寇的軍事進攻，造成了空前嚴重的國難的開端——「九一八」和「一二八」。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軍佔領瀋陽時起，不過一年日本幾已吞併我東北四省的全部，並成立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協定。

但是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者的貪慾，豈祇這區區東北四省；它於搶去東北四省之後，南下圖吞華北，西進覬覦察綏，北向則陰謀進攻蘇聯，這些野心企圖是昭然若揭，有目共睹的。而且頗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是，日本匪寇時常在「反赤」的煙幕之下積極進攻中國和威脅蘇聯；又時常在「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口號之下來消滅中國的主權獨立行政完整和進一步地進攻蘇聯。這樣，表面上到現在為止，倭寇的侵略只限於對我，實際上則對我即所以對俄。而且，當日軍積極向北滿發展，企圖強奪中東鐵路時，事實上它已在直接向蘇聯的遠東權益

進攻，它的企圖併吞內蒙、佔領華北，也爲的是要進攻蘇聯。

遠東形勢發展到這種嚴重的地步，迫使中蘇關係有重新改變的必要。中蘇兩國同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對象的這一局勢，迫使兩國關係由歧途而納入正規，由反常而恢復正常。這便是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恢復邦交爲起點的中蘇關係的第四時期。這第四時期實在還可以分爲兩個階段：從復交到訂立不侵犯條約（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是一個階段，從訂立不侵犯條約到現在尙未終止是另一階段。

從復交到互不侵犯條約，差不多有五年光景，這在中蘇邦交史中當然不是很短的時期；可是在這不短的時期內，中蘇關係除了勉強維持正常邦交以外，沒有一分一寸的進步。或者說得好聽些，它的進步實在太遲緩了，這自然也不是偶然的。因爲在遠東的國際關係上，固已有使中蘇關係好轉的條件存在，可是在內

政的條件上，依然與斷交時期毫無二致：我國兩大政治集團依然在互相搏鬥中，致國內和平統一不能實現，而對外國策祇能一再妥協。內政上這種重大的牽制（自然外交上也有不少阻力），是中蘇關係不能進展的最大原因。記得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曾數度向我政府徵詢關於訂立不侵犯條約的意見，可是我國終因上述種種牽制而未予同意。這樣，對外既不能跟一個可以共患難的友邦建立親密的關係，對內則將大部分國力消耗在國共兩黨的內戰上，這才招致倭寇無限度的侵略，使中華民族的生存和國家的獨立，遭遇到最後的威脅。蘆溝橋事件的爆發，正如蔣委員長所云，是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這一最後關頭的到臨，才逼着全中國實行空前的大團結，造成政治上空前的統一，尤其值得慶賀的是促成了敵對十年的國共兩黨的重修舊好，精誠團結。

國內政局的這一劇變，自然不能不在對外政策上反映出來。第一個最顯著

的反映便是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這就是中蘇關係發展第四時期第二階段的開始。直到寫這本小冊子時為止，它的發展依然尚未超過這一階段。

不過單就中蘇不侵犯條約而言，它表面上雖祇是消極的互不侵犯，而實質上却含有很大的積極意義。在這條約訂立以前，敵人常常挑撥離間我們跟蘇聯的關係，以「共同防共」為旗幟，企圖把我們拉進侵略陣線中去，使我們失去內政和外交的自主性。中蘇不侵犯條約的訂立，把敵人這一陰謀的實現的可能性完全剷除了。這就明白地表示，我們要堅決地站在和平陣線方面，要為民族國家的獨立自主而與敵人鬥爭到底。同時，這一條約又是中蘇兩國進一步合作，共同反抗侵略，以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的肇端。

自然，眼前的中蘇關係還沒有發展到客觀形勢所要求的程度，還未能充分滿足抗敵除寇的要求，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這種關係確實在繼續發展中。我們

相信：只要我們始終貫徹抗戰到底，在日趨堅強的民族統一戰線基礎上，爲民族生存和世界和平而奮鬥到底，那末中蘇兩國之進一步的合作，是終於要到來的。

三 互助的可能與必然

說明了中蘇關係之史的發展後，我們再要就兩大民族互助之可能與必然，作進一步的分析。這當從兩國互助的客觀基礎和主觀要求，聯繫到國際和國內政治形勢之發展，加以分別和綜合的觀察才行。

首先從經濟關係上觀察。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之最高目標在於提高人民福祉，發揚社會主義的文化，而不在于利潤之追逐。中國在歷史現階段上則急需實現革命的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這種經濟建設的社會本質雖很可能是資本主義的，但其直接的任務，則在發展獨立的民族經濟（或國民經濟），從經濟上解除帝國主義束縛，脫離半殖民地羈絆，開發全國資源，增進國民財富及提高社會福利等。觀乎兩國經濟建設的任務和目的，可知兩國在經濟利害上沒有衝突的。

可能。因為蘇聯的生產，目的既不在利潤，它就沒有對任何民族實行經濟侵略的必要，須知一切經濟侵略的根源，都在於以利潤為目的資本家的生產方式。二十年來（十月革命迄今）蘇聯對外經濟政策的事實，完全證實了這一點。它對我國的商業關係純粹基於平等的原則，從未在我們方面攫取過某種經濟的特權，而且連這樣的企圖也未曾被發見過。

拿我們這方面來說，同樣地也絕無對外實行經濟侵略的可能和必要。因為我們是個經濟文化落後而物力（主要的指天然富源）人力却極充足的國家。縱然我們在現階段和在民族獲得完全解放之後所實行的經濟建設，可能是資本主義的（私人的和國家的但大有可能走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但是因為我們的生產力水準較之先進各國低落得太厲害，我們的鄉村和都市都需要經過一番長時期的一開荒一工作，在這時期內，我們必然只能依據平等互助的原

則，與各友邦維持經濟關係，特別是與精神上跟我們一致的蘇聯（因為兩國都反對資本帝國主義，都需要為國民謀福利的和平建設）維持平等互助的經濟關係。在中華民國的領土內，將來永遠不可能產生一種與今日歐美列強相似的經濟制度。因此，就客觀的形勢言，就中蘇兩國經濟建設的需要言，兩國互助是大有可能的。

而且，豈祇是可能呢，簡直是必然的。為什麼？因為中國要實現革命的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必先從不妥協的長期抗戰中爭取民族國家的獨立生存，而在不妥協的反侵略的抗日戰鬥中，必然要跟與中國有密切關係的一切友邦，特別是跟唇齒相依、精神一致的蘇聯，保持經濟和政治上的互助關係。我們在民生主義的國民經濟建設過程中，必須從利害一致的蘇聯和其他方面取得物質上的幫助（技術、人才、資金等）。

就蘇聯方面言，則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猛進，必將有物質上的充分餘力，如燃料、機器和各種工業品等，來支助新中國的建設。同時，它還有大批優良的技術專門人才可以派來幫助我們的建設。所以只要我們一貫地爲革命的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到底，在目前抗日的國防經濟建設中，在今後民生主義經濟體系的樹立中，蘇聯必然會在經濟上予我國以莫大的幫助，正如今日以前它幫助革命的土耳其一樣。在另一方面，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日臻繁榮，蘇聯又必須從地大物博天產豐富的中國，取得資源上的幫助，以增進它的社會主義的生產力。這它同時又必然要努力幫助我們開發富源，發展農產。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從中蘇兩國經濟關係上觀察，根據兩者客觀的經濟基礎和主觀的經濟要求，互助合作不但有充分的可能，而且還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再從政治關係上說，兩國也同樣地有互助合作之充分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先就蘇聯的根本政策來說吧。假如在帝制時代，俄國對我的關係完全是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的侵略關係，那末從一九一七年無產階級的十月革命以後，新的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政權，就根本改變了那種關係，推翻了過去俄羅斯帝國主義的民族殖民地政策。它不但不壓迫和侵略弱小民族，而且絕對地同情和維護被壓迫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它主張澈底的民族自主，直到承認民族的分立權爲止。蘇聯成立宣言裏寫着：

「自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以來，全世界各國就劃分爲兩個陣營：資本主義的陣營和社會主義的陣營。在資本主義的陣營內，有的是民族的仇視和不平等，殖民地的奴役制，偏狹的愛國主義，民族的壓迫和掠奪，帝國主義的橫行和戰爭。在社會主義的陣營內，則是：民族間的相互信任與和平，民族的自由與平等，各民族之和平共居與親睦合作。」

……惟有在蘇維埃的陣營裏面，……澈底消滅民族的壓迫，創造各民族相互信任的環境，與夫奠定各民族親密合作的基礎，才有可能。」

這種革命的民族政策的具體表現之一，便是蘇維埃政府首先放棄了帝俄時代對中國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特殊權益。而且迄至今日爲止，它是世界上對我放棄不平等條約和特殊權益的惟一國家。它既以平等待我，我們當然跟它有聯合的可能和必要，這是革命導師中山先生早就實行了的。

從另一方面講，蘇聯既然同情和贊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對於實施壓迫和侵略的帝國主義，它當然取反對的態度。固然，由於國際關係的錯綜複雜和各種客觀主觀條件的限制，它的反帝立場不能直線式地，過分急驟地實現，可是它的這一革命的基本政策，始終是要貫徹的。在這一點上，它又跟東方民族的反帝急先鋒中國，有結成同盟的可能。因爲革命的三民主義的中國，在現階段上的最高

任務是堅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生存；這就表示，中國是遠東乃至全世界反侵略反帝國主義的一支主力軍。而蘇聯則是全世界反侵略反帝國主義的大本營。這樣，就中蘇兩國立國的基本任務而言，它們原是一對不能分離的朋友，它們在反帝反侵略的歷史事業上，不但情有可原，而且勢有必然。

從「一九一八」——「一二八」長城戰役、冀東事件，乃至蘆溝橋和上海戰爭相繼發生以來，在過去這六年半中，日本法西斯軍閥匪寇們的節節進攻，把中蘇兩國置於同一受侵略的地位。日寇的侵略中國，直接的動機固在於滅亡全中國，實行田中奏摺中的大陸政策；然其間接的進一步的動機則在進攻社會主義的蘇聯。隨着全世界帝國主義內外矛盾的日趨激化，和平陣線和侵略陣線對立的日益尖銳，第二次全世界範圍的大戰已愈迫愈緊。這時國際侵略集團所最痛恨而

首先企圖下手的便是蘇聯——這一世界和平的堡壘。所以日寇的進攻中國，裏面含有準備進一步進攻蘇聯的意義，那是毫無疑問的（但其目前主要的直接的目的則在亡我國滅我種！）在日寇帝國主義這種直接威脅之下，中蘇兩國之政治的利害已達於絕對的一致，因為它們的互助合作，不但完全可能，而且已屬十分必要了。

再從兩國所實行的主義上說，我們也認為兩國不但無甚衝突可言，而且頗有相互為用、相互促進的可能。蘇聯所標榜的共產主義，乃是它的最後目標；而達到這最後目標的前一步驟，必須是目下尚在努力中的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特徵是什麼？主要的是階級剝削的消滅和有計劃的生產分配與消費。可是蘇聯在踏進社會主義時期以前，還有過一個所謂過渡時期的經濟，新經濟政策下的建設時期。在新經濟政策之下，蘇聯仍容許資本主義（私人的和國家的）的

存在，小商品經濟的存在；但後來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這些經濟成份便逐漸地被排除、被消滅或被改造過來了。這就是說，在一種革命的政權之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是可能用和平方式（即不必經過暴力革命）來實現的。

我們在目前抗戰過程中開始進行，而到抗戰勝利後應當全部實施的民生主義的建設，可以說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一種方式。孫中山先生說過「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一這句話表面上看起來雖很簡單，可是它的意義是非常深刻的。這句話的第一點意義是說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不但毫無衝突，而且可以互相一致的。第二點意義是表示民生主義所追求的目的，是和共產主義（註）同一的階級消滅，人人平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國界消滅，世界大同。第三點意義是根據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演講集的民生主義一章中的解釋，民生主義實在是適應着中國（乃至一切現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特殊環境的一種

達到共產主義的手段。在科學的意義上說，民生主義並不是一種社會經濟的形態（socially economic formation），它自身可能具有資本主義的本質，但在一個真正革命的政權（能澈底實現中山主義的政權）之下，它必然會開闢出非資本主義的前途來，以造成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和平轉變。這正與適應蘇聯的特殊環境的新經濟政策制度之促成類似的和平轉變相仿的。

由此可知，中蘇兩國就其所奉行的主義而言，不但毫無衝突而且在精神和目標上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可以說，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是殊途而同歸。正因為這樣，中國和蘇聯在主義的奮鬥上，亦有互助合作的可能和必要。

（註）共產主義有所謂「初級階段」與「高級階段」，「初級階段」就是通常所稱的社會

主義，「高級階段」才是普通所說的共產主義。這裏共產主義一詞乃廣義的，包括

初高兩個階段而言。

最後，從國際關係和對外國策上觀察，更可以看出同樣的必要來。

誰都知道，現時的國際形勢，最基本的是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的對立，在這種對立的形勢中，站在後一陣線的是日、意、德和在它們影響之下的波蘭、奧地利、匈牙利等。站在前一陣線的主角是蘇、法、英、美、中及在它們影響之下的小協約國、土耳其、希臘、波羅的海諸小國和中美南美諸國。在和平陣線中能最堅決地爲和平而奮鬥的，要算蘇聯。因爲別的資本主義列強的贊助和平，都爲了打算到自己眼前的利益（例如英國是打算保持大不列顛殖民帝國的現狀因而贊助和平），而並非根本反對侵略和民族的壓迫。蘇聯則以對外和平爲其基本國策，它根本反對任何侵略和壓迫，根本反對以任何理由將武力施諸他國。因爲社會主義的國家，根本不需要向別國尋釁挑戰，未受侵略而以武力侵入他國領土。斯大林在某處地方說過，波爾塞維克從未夢想到革命是可以輸出的。任何一個民衆的

革命都不會起來，假如它自己沒有這種需要的話。這兩句話，道破了蘇聯對於世界革命的態度，是給惡意誣蔑蘇聯的「赤色帝國主義」的妖言以當頭棒喝。這也說明了蘇聯縱然爲了贊助世界，也決不用武力把革命「輸出」到他國去。

就事實論，蘇聯自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常邦交以來，一貫地執行了睦鄰政策，並曾爲普遍的軍縮而奮鬥。後因國際戰爭空氣日趨濃密，它又爲普遍的集體安全而努力。自一九三三年起，與斷交十六年的美國恢復了邦交，同時又接連地與它毗鄰的許多國家（北起芬蘭南迄小協約國及近東諸國）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一九三四年加入國聯；一九三五年與法國訂立互助協定，繼而又與捷克訂立互助協定，爲了消除日本侵略者尋釁的機會和減少與它的磨擦而毅然出售了中東路。最後，一九三七年八月它又與我國訂立了不侵犯條約。最近，隨着意大利的退出國聯，若干國家有修改盟約以迎合侵略者的意思，而蘇聯則竭力反對

修約而且主張變國聯爲集體安全的和平機構，證諸這許許多多事實，我們可以相信，蘇聯確實是一貫地爲世界和平而奮鬥的，它確實堪稱爲和平陣線的中堅。

中國怎樣呢？

中國的基本國策是對外要求國家民族的獨立生存與自由平等，對內則要求建設一民權民生主義的新中國。在這一基本國策之下，它的要求和平、反對侵略，是十分明顯的。正因爲它要貫徹這種基本國策，它最迫切地需要與任何國家維持和平友好的合作關係；同時也正因爲它要貫徹它的基本國策——要求獨立生存——所以它不能無限制地忍受侵略，從去年蘆溝橋事變起被逼而對寇抗戰。日寇之侵略一日不止，中國的抗戰就一日不停。因此，在對外關係的基本國策上講，中國和蘇聯的立場又是完全一致的。

不僅這樣，從中國全面抗戰展開，蔣委員長與中央政府一再表示抗戰到底的態度以來，中國事實上已站在全世界反侵略的和平陣線的最前線，在它的抗

戰的前途上，實維繫着全世界和平陣線的命運！所以假使說蘇聯是世界和平之最堅毅的奮鬥者，那末中國便是世界反侵略運動的急先鋒。從這種見地上看來，中蘇兩國在國際和平陣線對抗侵略陣線的奮鬥中，亦絕對有互助合作的可能與必然。

根據以上種種客觀條件和主觀立場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蘇兩國的友好互助應當是兩國的正常關係，而兩國的分裂仇視却是一種脫離了正規的變態。應當明確地肯定，一九二四——二七年兩國的密切合作決不是偶然的，而這種合作的基礎與條件，現在不僅毫無消失，且事實上因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意德帝國主義的橫行而更加強化了。

正因為這樣，所以當倭寇一步緊一步地向大陸侵略過來而中蘇關係尙滯留在平淡的階段上時，我們就早已高呼中蘇合作，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共同

反抗侵略。於是訂立中蘇互助協定的要求，就隨抗戰的擴大和延長而逐漸成爲普遍的呼聲了。

中蘇互助的展望和我們的任務

——附評依賴主義失敗主義並揭露破壞中蘇關係的陰謀。

看了前面的分析，可知中蘇的密切互助，實在是非常地必要；而且事實上，現在兩國已正在循着這條道路前進。我們相信，每一個愛國的同胞，都無條件地贊助中蘇的親密合作，以對付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蘇聯的人民，當然也無疑地擁護這樣的合作，因為從日寇開始對我侵略，特別是從我國展開全面抗戰以來，全蘇聯民衆無時對我不表示着熱烈的同情和準備着跟我們一致作反抗侵略的鬥爭。不過現在的問題不是中蘇互助必要與否的問題，也不是兩國民衆願意不願意互助的問題（這些實已完全不成問題的了），目前一般人所注意和疑慮的問題是：爲什麼直到我們抗戰了七個多月的現在，中蘇間還未成立

像法蘇間所訂那樣的互助協定呢？究竟要到何時才能實現互助協定呢？

自然，對於反侵略的中蘇互助協定本身，我們原則是絕對擁護的，而且事實上一般覺悟的前進的民衆，幾年前就已勇敢地提出了這樣的主張，現在他們依然在爲貫徹這一主張而奮鬥。可是在我國已受到敵人的侵略，一大部分領土已被敵人佔領去的現在，來談中蘇互助協定，實際上等於要求蘇聯單方面出兵助我，而不是什麼互助。因此，事情就歸結到能不能要求蘇聯出兵和蘇聯能不能出兵的問題上來了。

目前不少的依賴主義失敗主義者，正在大唱其「蘇聯出兵論」；他們把中國民族解放的前途完全維繫到蘇聯出兵的希望上了。在抗戰進於第二階段，軍事上遭到了相當重大的暫時挫敗以後，我們的困難正在一重一重地增加起來（但敵人的困難也一樣地在加重起來，也許還比我們更厲害些）於是一般認

識不清意志薄弱的分子，對於抗戰勝利的信心，就開始動搖起來；他們初則畏縮不前，繼則垂頭喪氣。在這垂頭喪氣的當兒，他們引為惟一安慰的，便是蘇聯出兵。他們認為只有蘇聯迅速出兵和我們共同抗日，我們才有轉敗為勝的希望。可是眼見着北五省幾乎全部淪陷，上海、杭州和首都又相繼被佔，亡國的危險似乎一天比一天逼近到我們頭上來的時候，而失敗主義者的最後希望——蘇聯出兵——却還是沒有成爲事實；於是他們就由垂頭喪氣而完全陷於悲觀失望了！

這種「蘇聯出兵論」者把我國抗戰勝利的前途，完全維繫於蘇聯的出兵；後來又因希望不到而埋怨蘇聯，攻擊蘇聯。其所以致此之因有二：第一，他們不理解我國抗戰之獨立的意義，過分強調了日寇進攻蘇聯的陰謀，而忽視了它的滅亡中國的目的；第二，是自暴自棄（無自信心）的依賴主義失敗主義在作梗。對於這兩點傾向，實有予以嚴格糾正之必要。

關於第一點，「蘇聯出兵論」者認為日寇侵略中國爲的是進攻蘇聯。這樣的理解，把現時日寇的主要目的——滅亡中國，實現大陸獨霸計劃——輕輕地放過去了。照這種人的見解，彷彿此次日本大舉侵略，僅僅是暫時假道而已；彷彿它將來進攻蘇聯的目的達到以後，還會把所佔領的中國領土客客氣氣地奉還中國！這是邏輯上必然要產生的結論。我們必須嚴厲地打擊這種忽視日寇滅亡中國爲其目前主要目的的謬見。這般人既以日寇侵略中國爲其進攻蘇聯的手段，因而就得出我們抗戰是在替蘇聯打先鋒的結論來。這樣，我們民族解放的神聖抗戰之獨立意義，就被這般沒出息的懶漢們完全忘掉了。蔣委員長教示我們：此次我們的對日抗戰是「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爭取獨立生存之戰爭」。又云「爲民族生存獨立而戰，同時卽爲國際和平正義而戰」（告國民書）。對這兩句話，我們每一個愛國的同胞都有明確理解的必要。日寇眼前的最大目的

是要亡我國，滅我種；因而我們的抗戰爲的是要解除亡國滅種的危險；這是我們自己的切身任務，是在執行着一種獨立神聖的歷史使命，而絕對不是什麼替誰打先鋒。

不過這一爲中華民族爭生存獨立的抗戰，同時亦卽爲維護國際和平正義（而不是爲那一個國家）的戰爭，因而它的意義就更加偉大。我們可以自豪：我們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起，光榮地擔負起了捍衛世界和平、伸張人類正義的反侵略鬥爭急先鋒的任務。這一神聖的戰鬥，我們是絕對地處於主動地位，絕對沒有什麼爲人作嫁的意味，因而我們也不應存一點點的依賴心理。

自然，誰也不能否認，日寇對我的侵略戰爭中含有進攻蘇聯的意義，然而這跟日寇侵我目的，在進攻蘇聯的見解大不相同。卽就目的和手段來說，也至少應當從它們的相互關係上去理解，而不應片面地規定某者是手段某者是目的。假

定承認侵略中國是手段進攻蘇聯是目的的話，那末就過去六七年來的事實作證，日本向來高舉反赤旗幟，在行動上不斷地向蘇聯遠東邊境挑釁，藉以掩護其大舉侵略中國的行動。這樣，進攻蘇聯顯然是手段，侵略中國倒是目的了。再換一個說法，在將來日寇進攻蘇聯的時候，我們何嘗不可以說它進攻蘇聯的目的是在鞏固其對中國的侵略呢？由此可知，講到手段和目的，我們必須從它們的相互關係上去理解，而尤其重要的是應當把握住同一事件在某一特殊階段上的主要意義。同一日本帝國主義對大陸的侵略，在現階段上，其主要的意義（目的）便在滅亡中國，獨霸東亞。唯其如此，所以我們打擊敵人這種陰謀的抗戰，才有特別偉大的獨立意義。

關於「蘇聯出兵論」者的第二點意識上的根源，便是自暴自棄的依賴主義、失敗主義。這點跟前一點顯然有着密切的聯繫。正因為忽視了我國抗戰之獨

立的意義；以爲我們只是在替蘇聯打先鋒，這樣就把自己神聖的解放戰，自己在全世界反侵略運動中的主導作用，完全看成被動的、從屬的、輔助別人的舉動和作用了。正因爲這樣，所以在他們看來，中國抗戰必須依靠蘇聯出兵相助，才能獲得勝利。不然的話，靠自己單獨作戰，結果必歸失敗！一切悲觀失，乃至妥協投降的反動情緒，都由此而生。蔣委員長諄諄告誡吾人：『此次抗戰，爲國民革命過程中必經之途徑，中國欲……解放全民族之束縛，完成新國家之建設，終不能不經此艱難奮鬥之一役。……且今日所遭之挫折，尙未達到艱危之極度……吾人爲國家民族與世子孫計，犧牲雖鉅，無可避亦無可辭……不問國際形勢前途如何，必當盡其在我，初不必遽形失望，尤不可稍存依賴。』蔣委員長這一番英明果斷的指示，令人愈讀愈起敬崇之心。他的話可說句句都是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一分鐘也不能不牢記奉行的。在那般依賴主義失敗主義者羣中間，我

相信一定不乏擁護蔣委員長的人，但是你們僅僅口頭上喊喊擁護的口號，而意識和行動上老是保持着依賴主義和失敗主義，這不是擁護領袖，而是無視領袖，背叛領袖！

綜上所說，我們的中心意思是排斥那種存着自暴自棄的依賴心理，忽視對日抗戰的獨立意義，而把希望都寄託於「蘇聯出兵」的思想，以及排斥由此思想所產生的妥協屈服的主張。但是這是不是說，我們根本反對爭取蘇聯對我給予進一步的幫助呢？絕對不是的。我們無條件地應當（而且正在）爭取這樣的幫助。除了運用我們正確的外交政策以直接從事爭取外，我們百折不回地長期抗戰本身就是爭取這種幫助的主要手段。而且我們不僅要努力爭取與蘇聯進一步的合作，還更其要爭取國際和平陣線中一切國家的進一步的援助，以達到集體制裁侵略的目的。然而這種爭取援助的努力是主動的，不是被動的，是自力

並不是依賴的等待。

我們並不否認，到現在為止，中蘇合作的程度尙未能適應中國民族危機和遠東和平危機的客觀要求。我們亦不否認，到現在為止，蘇聯乃至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對我們的幫助，還是不能令人完全滿足的。正因為這樣，我們今後更應加倍努力，動員全國民衆的力量，充實和加強政府機構的領導，進一步地鞏固抗日的民族統一陣綫，堅決地實行對敵人的反攻，積極地爭取更有利的國際形勢，促成以中蘇互助爲核心的反侵略的集體安全制。

然而可惜得很，許多悲觀分子却不作如是觀。他們看到現在中蘇兩國的關係還停滯在消極的互不侵犯階段上而未見有進一步的重大的轉變，就感覺大地失望和悲觀。

確然，從大體上說，抗戰七個月來，中蘇關係是停滯在互不侵犯的階段上。一

部分人因而表示悲觀和失望，這也是事實。但是我們不應當忽視事實的另一面。目前中蘇關係的階段雖尚未越過去年八月所成立的互不侵犯條約的限度，但在同一階段內的量的發展是在進行着的。試看最近三個月來，蘇聯供給我們大批的軍用飛機，機械化武器，軍事技術人員等種種人力和物力的幫助，這是抗戰的第一時期所沒有的。最近蘇聯大使的更換，我國孫院長的赴俄，也都是兩國關係進展中的重大徵兆。在最近第百屆國聯大會上，蘇聯代表竭力反對修改盟約第十六條，主張集體制裁侵略援助我國。結果國聯才通過了會員國個別援華制寇的決議。所以從去年八月到今日，中蘇關係之質的突變，雖尚未實現，而量的發展却是不小的。我們可以深切地相信，只要我們繼續堅決地跟日寇鬥爭，在一種適當的時機到來時，那種質的突變終究是要實現的。

對於現狀表示悲觀失望的人們，大別之有兩類。一類是熱情的，真誠的，純潔

的，但是幼稚的，粗率的，懦弱的。他們對抗戰很熱烈，對蘇聯很崇仰，因而對蘇聯的期待也很殷切。在抗戰之前和抗戰初期，他們甚至竭力抨擊過等待主義和對國際形勢的依賴主義。他們自信：只要我們堅決地發動全面抗戰，並且堅持不妥協的犧牲精神，與侵略者拚命到底，無產階級的蘇聯一定不久就會挺身而出，用實力來和我們共同抗日。可是現在我們已經抗戰了半年，我們上下一致的犧牲精神確實愈來愈堅決，我們要與日寇拚命到底的立場業已由我們的領袖再三闡明，——在這時蘇聯為什麼還遲遲不決定出兵呢？難道我們的態度還不夠堅決嗎？我們的犧牲還不夠重大嗎？我們的危難還不至於威脅到蘇聯自身安全嗎？在這些疑問之下，這班熱情純潔但又幼稚直率的人們，便開始失望和悲觀起來了。

這種失望對不對呢？當然是絕對要不得的。根本的毛病在於他們把國際關係看得太簡單太隨便了。要知道國與國的關係的改變，決不像個人與個人的關

係那麼簡單輕便，容易改變的。在個人的關係上，我與你今天利害衝突就鬧意見，明天衝突點消除了，雙方立刻言歸於好。國與國的關係的轉變，却萬萬沒有那樣簡便。原因是在國際間的利害關係是由異常複雜的因素編織成的；某幾種因素的改變固可能促成兩國關係的轉變；但在其他許多因素尚未隨之而改變時，這種轉變的可能，不會立刻變成現實。

目前的中蘇關係正處於這麼一種狀態中。就目前中蘇兩國本身講，雙方的密切合作都感覺到不僅有高度的可能，而且有急迫的需要。但是要使這種可能成爲現實，必須具備兩當事國自身以外的其他國際關係上的各種條件。這首先就是取得別的反侵略的列強——英美法諸國——的同情的諒解；換句話說，是要爭取世界和平陣線之進一步的強固。我們知道，蘇聯出兵援助中國的根。本意義。是在發揚和平力量打擊侵略集團。而日寇和其他侵略者的一貫陰謀，則常常

用「赤化危險」去打動英、美、法等資本主義列強的心，藉此以拆散正在鞏固起來的和平陣線。假如在世界和平陣線尚未充分鞏固，某些列強對於打擊侵略國一舉尚存着相當動搖猶豫的態度時，蘇聯不顧牠們的意向而鹵莽地出兵助我攻日；這樣，結果一定中了侵略者的毒計，把動搖的列強推到侵略者方面去。結果就很可能由正在鞏固的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的對立，一變而為世界資本主義列強對社會主義國家和求解放的被壓迫民族之「反赤」的對立；這樣，蘇聯的出兵助我，結果不是發揚和鞏固和平勢力和打擊侵略集團，事實上倒反弄成削弱和拆散和平勢力而助長與加強侵略集團了。這對於中蘇兩國本身的利益，當然是一個致命的威脅。

在這樣的估量之下，蘇聯的出兵助我，因而亦即中蘇互助協定的簽訂，在這種時·尚·無·可·能·而·且·亦·無·必·要。

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不需要從蘇聯，乃至從其他列強方面爭取更強的援助；相反的，爭取這種外援，促成中蘇聯合，正是目前我們抗戰的外交陣線上的首要任務。我們不必諱言，過去我們在這方面的奮鬥是不夠。可是現在我政府却正在這方面加倍努力；只要我們在軍事政治和外交上百折不回地奮鬥到底，自己不要忘掉鞏固世界整個和平陣勢和打擊世界整個侵略集團的遠大任務，中蘇乃至中英、中法、中美……之進一步的合作的時機，一定在不遠的將來會到來的。因此，一切的失望和悲觀，都是絕對地有害；對於中華民族的解放，對於全世界的和平與正義的維護，都是有害的。

而且在另一方面，上述那種幼稚而直率的見解很容易使那班陰險的、自覺的、卑鄙的妥協分子利用去，來散佈他們失敗主義的要求。這派人便是前面所指出的悲觀失望派中的第二類人。

假如前一類悲觀分子是純潔的，幼稚的，直率的，那末這類人却是卑污的，老奸巨滑的，陰險詭鄙的。他們在根本上反對親蘇而主張親敵，他們一向就是「赤色帝國主義」這一名詞的宣揚者。在抗戰發動以前，他們向來是中蘇關係進步的阻撓者，是世界的侵略者在我們國內的奸細，他們阻止中國加入世界的和平陣線。所以當前幾年全國民意加速傾向聯俄制寇的時候，他們便是這種傾向的鎮壓者，破壞者。等到抗戰發動後，我們賢明的中央當局毅然與蘇聯訂不侵犯約和堅決參加和平陣線時，這羣阻撓中蘇關係的小醜，表面上只得暫時沉默起來（當然暗中還在進行其破壞工作。）到最近，他們一見到許多對中蘇關係打如意算盤的幼稚直率的依賴主義者，由熱情而陷入失望的時候，便又蠢動起來，利用這種相當普遍的失望情緒，來破壞離間正在好轉的中蘇關係和散佈失敗主義的思想。他們說：你瞧，蘇聯是何等地不可靠！我們犧牲得這樣大，跟日寇這樣堅

決的拚命，替它打了頭陣，它却老是按兵不動，坐收漁人之利。它的扶助被壓迫民族的政策，現在證明是完全虛僞的了……

愛國家愛和平正義的同胞們！我們應當大家警惕起來，予這種萬分危險的陰謀以致命的打擊。這種陰謀派的言論，是百分之百的日寇法西斯軍閥的代人的言論。我們的神聖抗戰，自有其獨立的民族的和國際的歷史意義，根本談不上什麼「替別人打頭陣」。至於蘇聯對我國的物質和人力的幫助，正在着着進行中。只要我們繼續堅決地與日寇奮鬥，爲三民主義的澈底實現而奮鬥，中蘇關係必然會達到進一步的質的轉變，那是無疑的。不過在奮鬥的過程中，我們隨時隨地要給一切悲觀失敗主義者，特別要給專以破壞中蘇合作，破壞民族統一陣線爲任務的托洛茨基派漢奸們以致命的打擊！

大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完稿於西京臨大

大時代叢書
中蘇互助論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 者 沈 志 遠
主 編 金 則 人
發 行 人 張 靜 廬
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 店
上海福州路
廣州永漢北路
梧州大中路
宜昌二馬路
重慶武庫街

分 店
長沙東長街
武昌胡林翼路
成都祠堂街
西安南院門
昆明西華路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漢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三十日粵再版

發行額：五〇〇〇本

〔外埠酌加郵寄費〕

實價 一角五分

出版物：第0210號
乙 項：第112號

KBC

G

829.512

6